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干出了一片新天地。”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了《中国智慧》一书。本刊特将2018年12月12日题为“回顾改革开放发展经验：从中国故事到中国智慧”出版座谈会上部分专家的发言摘要编辑，与读者一起分享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学习体会。刊发内容已经发言人审定。

从中国故事到中国智慧

蔡 昉 张宇燕 张晓晶 姚枝仲 魏后凯 张晓山 吴国宝
黄群慧 李 平 潘家华 高文书 王延中 魏 众 刘元春

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中国智慧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智慧，要从这个宏大的历史主题着眼。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最为成功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最终将以14亿人口完成由盛至衰再至盛的完整历史演变，而成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伟大奇迹。中国作为一个经历过经济发展诸种类型和阶段、依次解决了一系列经济发展面临问题的样板，成为一个关于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的经验宝库。因此，从事中国研究的经济学家，也有责任成为这一成功故事的讲述者，将这些经验升华为中国智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同时对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转换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1978—2017年近4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了35倍，由劳动生产率17倍提高所支撑。人均GDP实际增长了24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超过16倍，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在1981—2013年期间，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界定的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即每天收入不足1.9国际美元（2011年不变价）的人口，从18.93亿减少为7.66亿，同期中国从8.78亿减少为0.2517亿，这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扶贫的贡献率为75.7%。

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从1978年1.8%提高到2016年的14.8%，先后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

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及其体现的中国智慧，既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借鉴，丰富发展经济学文库，更是中国自己今后继续改革开放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按照以往的发展理念和改革开放逻辑，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从中获得新的增长动能。

把孔子关于年龄“四十不惑”的认识用在今天，就是说改革开放40年之际，正是深刻总结经验和启示，把中国故事提升为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方案的恰当时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精神，为这个理论概括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本文尝试对其中几个重要的经验进行概括。

（一）从指导思想、原则和理念层面

确立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坚持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指导改革开放，以“三个有利于”判断改革开放成效。

中国摒弃了这个时期国际上流行的指导发展中国家调整和转型国家改革的“华盛顿共识”。一方面，许多国家以惨痛的教训证明了这种“共识”的失败；另一方面，中国以其创造的人类社会发展奇迹，证明了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是正确的。例如，中国扶贫脱贫攻坚实践及其取得的成就，被世界银行赞誉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最好的教科书”，其中体现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核心要义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伊斯特利谈到世界上的穷人面临着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尽人皆知，即全球有数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亟待获得发展援助。而很多人避而不谈的第二个悲剧是，几十年中多个国家投入了数以万亿美元计算的援助资金，却收效甚微。这个悲剧的产生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也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只有在中国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这个中国方案就在于中国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成果共享，以及实施针对区域贫困和精准扶贫的扶贫战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推进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等中国智慧和方案，都是中国对人类新的更大的贡献，也是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

首先，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改革路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决定了改革的终极目标，由此选择改革方式，确定改革时间表，完善推进改革的路线图，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改革推进方式，也从实践上证明了中国经验的有效性和一般意义。

其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改革开放发展的出发点，也是保持实施各项改革开放措施的落脚点。在整个改革开放发展期间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独树一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有效化解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成功应对了特大水灾和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破坏，也渡过了诸如价格闯关和减员增效等激进改革造成的难关，在经济总量扩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也越来越小。

再次，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分享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总体上遵循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理念。由于正确处理并与时俱进调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改革开放的推进坚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发展成果总体得以分享。例如，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路径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提高，目前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保障，或者更广义的基本公共服务（医疗、基础教育、养老、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治理等）全面提高均等化水平的新阶段。

最后，从手段论到目的论的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环境作为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的一个重要方面，揭示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与时俱进的发展目的论，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大了治理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三）从实施方式和步骤层面

首先，从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到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对外开放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启动、同步推进的，也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不仅从供给侧引进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从需求侧利用了巨大的国际市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国际上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以及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外开放进入更高的层次，需要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

其次，从梯度推进到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从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进而到21世纪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在相对不发达地区加大了人力资本积累，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体制和政策环境，创造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发展的区域协调性明显增强。

最后，由城乡一体化破题的三农政策。中国的改革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发起，同时奠定了三农政策的起点。在改革过程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导向始终集中在城乡关系调整上面。党的十九大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把三农政策提升为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国家战略。

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进一步对外开放

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前夕，天时地利人和的必要条件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最高决策层毅然决然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窗口，使中国得以不失时机地成为世界潮流的预流者，一往无前地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最终改革了自己、改变了世界。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进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2000年，起点的标志是开启改革开放政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打开国门、接触世界、参与国际分工并尝试性地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洗礼。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2011年，起点的标志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个阶段，中国全面拥抱或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由这个体系的边缘位置不断向中心位置接近。第三个

阶段是2012年至今，起点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就位。在这个阶段，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带领中国开启了“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征程，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开放新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国参与、融入和引领世界经济，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各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中国GDP从1978年的0.3645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率约为9.5%，中国成长为全球经济规模第二大国，人均GDP也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中国奇迹。其二，中国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减贫人口为全世界减贫贡献了70%以上的份额，创造了世界减贫史的中国奇迹。其三，中国科技界实现高温超导、中微子物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突破，产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通讯、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高速铁路、航空母舰等工程技术成果，创造了世界科技史的中国奇迹。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既是老一辈领导集体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国家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体说就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明确产权保护，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鼓励科技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深化国际分工与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中，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源动力；技术进步既是制度变迁的重要诱因又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制度变迁不仅可以改进激励机制以鼓励科技创新，而且可以扩大市场规模，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更多“得自贸易的收益”；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会使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得以深化，支持制度与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些因素的良性互动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最终实现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改革与开放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对内改革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每个领域的改革均涉及开放，同时也为推进对外开放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而基于贸易往来、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等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其本身就是改革，它们反过来又会深化国内各领域的改革。

自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断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变成了融入其中的主要贡献者。现在，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接触”（Engagement）调整为“规锁”（Confinement）。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经济若要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还是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仍需要以自身开放来引领和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开放、共同开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区域经贸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创造良好国际条件。

未来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更好地结合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说到小平同志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我们往往就会想到，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应该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但如果再谈到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故事，我们又会觉得，改革更应该从底层发力、逐步扩展开来。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恰恰是这两个故事的合一，既有顶层设计亦有基层探索；二者的有机联系与频繁互动，才是改革走到今天的要诀。

不过，纵观改革40年的历程，有时候顶层设计多一些，有时候基层探索多一些，这往往会带来改革进程中的“不平衡”。

关于顶层设计不够：比如双轨制改革阶段，基层探索多一些，但因没能在顶层设计上有一个预先的谋划，付出的代价就多一些；又如房地产发展，“十年九调控”，结果不尽如人意。如果说我们只是通过各种控制把房地产这一不动产变成所谓“冻产”的话，实际上还是缺少总体谋划和长效机制，缺乏顶层设计。中国改革基本上遵循了一条“周边推进”的战略，先处理一些容易解决的问题，将最难处理的问题放到最后来解决。这种做法具有稳健的一面，但也带来很多挑战：比如双重体制的摩擦、不同领域的改革未能协同推进、不平衡战略带来的问题。这也导致渐进式改革的弊端：改革缺乏协同性、系统性、全面性，从而不同领域的改革有快有慢，导致体制性套利，滋生出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全面而彻底的改革难以推动。

关于基层探索不够：比如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还有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休克疗法，正如蔡昉副院长所说，主要还是基于一些先验的认识，缺乏实践

的检验。这里简单说一下王安石变法。其一，王安石变法有一个崇高理想且有神宗皇帝支持，这是很多顶层设计都必备的要素。王安石所要实现的理想是上追尧舜，连唐太宗都不放在眼里，“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其二，变法未能获同僚支持，缺少“统一战线”。比如欧阳修是竭力奖进王安石的前辈，司马光是王安石同事好友，程颢也是很有意襄助王安石的人，但这些人都不能与王安石始终共事，实在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其三，王安石的新法，因为执行者不得力，好的改革政策文本在实践中出现“变形”，从而全失立法的本意。其四，急于求成之心理。急于求成心理实际上和休克疗法有一拼，就是希望快刀斩乱麻，很快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很多问题犬牙交错、纠缠不清，改革要有耐心与定力，“缓图之”才能出成效。

当然，对于改革不能苛求。从哲学层面讲，都要想好了再做，是不现实的。美好的蓝图也是来自于对实践的认知。蓝图绘得好不好，甚至取决于对于实践把握的程度。从实践到认识，之后再实践再认识，这恰恰说明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的一个辩证关系，也是知行合一的根本体现。

未来看，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地方政府以及国企改革，而这两者，都需要基层大胆创新，在实践中获得灵感，从而将改革之路越走越宽。不过，国企改革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不能简单地归于执行不力、创新不够、基层探索不行。在一定意义上，也还需要顶层设计有更明晰的定位和方向，这包括现在提出的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原则。所以，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这一重要的中国智慧，不仅是过去40年创造中国奇迹的法宝，也将是中国未来改革成功的关键。

宏观经济：坚持稳中求进统领

姚枝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1978—2017年这40年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最快和增长最稳定的国家。40年间中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9.6%，GDP增长率的标准差为2.7个百分点，用变异系数来衡量的GDP增长率波动程度为28%。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源于采取了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改革和发展政策，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则源于采取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相对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

40年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加上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经验教训，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这套框架包括宏观经济管理

的三大支柱：总需求管理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总需求管理政策以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定的物价和充分的就业为主要目标，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总需求管理政策就是要通过财政货币政策使总需求增长稳定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当出现总需求低于潜在产出时或者总需求不足时，可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增长；当出现总需求高于潜在产出时或者经济过热时，可以使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抑制总需求增长。

中国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与发达经济体有一些不同。首先，中国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决策效率比发达经济体要迅速，能够在很短时期内针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反应。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水平还不高，财政政策的使用空间还较大。其次，中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基于规则的利率政策。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能带来预期稳定的优点，中国也宣布宏观经济政策的通货膨胀目标。如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消费物价增长3%左右的目标。但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以实现通胀目标为唯一目标，还要综合考虑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不以利率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还在使用法定准备金率、各种借贷便利等数量型政策工具。这与中国目前还没有基准利率有关。

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但是有两个缺陷：一是无法有效抑制金融市场的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无法改变潜在增长率。金融稳定政策用于弥补第一个缺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于弥补第二个缺陷。

金融稳定政策以避免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and 维持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以完善金融监管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为主要手段。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和各国的实践表明，金融监管重在实现监管全覆盖和防止监管套利。宏观审慎政策重在从宏观角度和跨市场传染的角度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并采用逆周期政策工具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完全吸取了这些经验教训，并结合自身实际，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来统管金融稳定政策，防止了分部门分行业实施金融稳定政策可能带来的监管死角、监管套利和难以识别跨市场传染的系统性风险等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为主要目标，以结构改革为主要手段。结构改革可以囊括范围很广的选择，包括：通过调整创新政策、完善创新创业体系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通过改革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速

度；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调整生育政策提高劳动力供给；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资本积累等等。而且，在不同的时期，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可以不一样。随着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阻碍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的结构性问题可能和当前所遇到的问题完全不一样，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也可以随之发生变化。

以总需求管理政策、金融稳定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大支柱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既来自中国的实践，也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既符合中国实际，又能逻辑自洽，三大支柱各自有自己的功能，又能弥补其他支柱的缺陷；三大支柱三位一体，不可偏废，同时又可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其政策内涵。在这三大支柱中，总需求管理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均强调实现经济稳定，强调“稳”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强调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率，因而强调“进”字。可见，用“稳中求进”来概括中国的这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是非常合适的。

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凸显了中国智慧

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经历了从早期的梯度推进到后来的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追求经济效率和增长目标，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采取了一种效率优先、梯度推进式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支撑这种梯度推进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转变、国家投资布局重点逐步东移以及在改革开放等方面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尤其是沿海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差距的快速扩大。

为改变这种状况，1991年中国在“八五”计划中正式提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由此拉开了从梯度推进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支撑这种战略转变的主要措施，包括推进实施并完善区域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调整国家投资和产业布局政策、大力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积极推动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正是由于这种战略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区经济呈现相对均衡增长态势；二是产业布局由集中转变为扩散；三是东西部差距由扩大转变为缩小；四是老少边穷地区发展加快，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国内外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中国没有照搬国外的模式，而是从自身的国情出发，采取梯度推进的方式实现了由早期的不平衡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实现这种由不平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虽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其成效却是十分显著的。它不仅确保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繁荣，而且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的普遍发展，地区发展差距已经开始全方位缩小。可以说，经过长期不懈的积极努力，中国已经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为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

这一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其核心就是多元、渐进式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它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对区域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思想，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和顶层设计。这一思想的实质是非均衡协调发展，它突破了传统的平衡发展论和不平衡发展论的理论框架。二是实行多层次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包括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在内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战略，再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多中心网络开发的国土开发战略，从不同层面共同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针对不同的经济功能区、主体功能区和特殊类型区，实行分类管理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既较好地体现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又有利于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

40年农村改革的经验和启示：改革的经验和启示凝练为智慧

张晓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基层创新的成功取决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绝不是单纯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而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几十年固守的计划经济发出的第一声炮响。始于1950年代的包产到户，20多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始终名不正言不顺，成不了气候，这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经营之所以能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是得益于1978年5月份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

是”的严重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家庭承包经营这样发源于基层的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发展和壮大。

（二）渐进式改革的启示

乡镇企业崛起的意义是，在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在原有体制和部门外，生长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部门，如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等，这些部门所产生的可观经济增量降低了传统部门的经济份额，摊薄了改革的成本，使帕累托改进有了经济支撑，这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随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逐步完成、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乡镇企业作为资源配置通道的特殊作用逐渐消失，其行政依附性和产权不清晰的缺陷则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也就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是一种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所支付的成本的基本前提下，关键问题是制度变迁的成本能否由利益相关者公平分摊，制度变迁的红利能否由利益相关者合理分享，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三）市场配置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巨大经济社会效应

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批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流动，是市场的作用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中国成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改善十分迅速。农村最优秀的一部分劳动力出来，他们最富于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这个迁移过程中，不仅仅农民工增加了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贡献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的大家庭中，农民工的外出就业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残酷的，充满了泪水、汗水、血和污浊。但广大农民工开阔眼界，学会技能，学到知识，成为创新型人才。很多农民企业家、回乡创业的能人之所以能开创出一片基业，都是依靠外出打工积累的经验、技能和资本。

（四）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发展

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进程中，回顾几十年来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演进的历程，可以看见一条清晰的政策发展轨迹。随着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所蕴含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将进一步向农业农村调整，全国范围内资源配置格局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将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将相互影响、有机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它将农村和城市共

同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框架之中，将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

中国减贫的经验和智慧

吴国宝（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完成了减贫上的两大历史性跨越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的飞跃：一是从1978—2012年，按中国现行扶贫标准计算，减少了6.714亿农村贫困人口，使农村贫困发生率从97.5%降低到10.2%，实现了大规模减贫，完成了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后，一般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基本消除极端绝对贫困的重要跨越；二是从2013—2017年，中国通过精准扶贫进一步使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发生率降低到3.1%，实现了多数工业化国家一般需要5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的将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0%降低到3%以下的另一个重要的跨越。

（二）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模式，并配合实行区域开发扶贫，实现了全国大规模的减贫

选择合适的改革战略和路径，支持大规模减贫。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选择了首先放开劳动力市场、然后再开放资本和土地市场的要素改革路线图和渐进式改革的战略，一方面保持了改革期间经济社会的稳定，避免和减少了原苏联东欧国家激进式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激烈的贫困人口的波动；另一方面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创造功能，对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78—2012年，中国农村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4643亿、增长了11.3倍，同期全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人数比重从7%上升到50%。

合适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实现大规模减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大力发展民营和个体企业、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协调区域发展，使绝大多数贫困人口通过分享国家的发展红利摆脱了贫困。

实行开发式扶贫，提升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通过扩大和分享发展成果减贫能力。中国政府从1986年开始实行开发式扶贫，一方面帮助贫困地区提升竞争能力、实现更快的发展；另一方面帮助贫困人口提高自身发展能力，更好地利用国家和地区发展所产生的机会稳定减缓和消除贫困。

（三）创新精准扶贫制度和办法，实现精准脱贫

从2013年开始，中国创新了大国扶贫对象识别和动态调整的制度和办法，

解决了贫困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和完善了保障精准扶贫的扶贫治理体系和扶贫制度；建立了可满足精准扶贫需要的扶贫资源投入和动员体系；根据剩余贫困人口的特点和脱贫需要，创新和实行了可包容多种贫困类型的扶贫方式。这些重要的制度和方式创新，使中国能够在宏观经济形势不利的条件下，实现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人。

（四）中国减贫的智慧和经验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取得的巨大减贫成就，既蕴含着特定的时空因素和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影响，也内含了一些可与其他国家分享的可复制的共同元素，这些经验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减贫和社会治理以及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知识财富。

改革开放后40年来中国探索并形成了大规模减贫和精准扶贫的中国经验。主要是：坚持发展减贫，以发展的方式，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将扶贫寓于发展之中，在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坚持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坚持精准扶贫，提高扶贫的质量和有效性；坚持扶贫创新，使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和方式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扶贫形势，长期保持较高的扶贫效率；坚持“政府领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的扶贫运行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群众的创造力；坚持持续扶贫，保持对扶贫开发专注的不懈的努力，使扶贫目标和方式得以延续与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的智慧

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讲述了一个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产业成长的故事，正在书写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产业发展新篇章。中国产业发展成功故事的背后，是将工业化共性规律与自己的个性化国情背景进行有效结合的中国智慧。

一是坚持“稳中求进”方针，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改革开放40年，始终采用“渐进式”改革，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导思想，以“稳中求进”为经济改革发展工作的总基调，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在保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基础上，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促进中国产业持续成长和不断深化工业化进程。

二是正确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迈向高端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始终不断沿着市场化改革方向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迄今为止的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成功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基于工业化发展阶段，把握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断提出合意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有效协调，随着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不同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有效地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

三是发挥产业园区作用，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产业园区是现代化产业分工协作生产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产业园区能通过政策引导聚集生产要素、提高集约水平、突出产业特色、优化产业布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工业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通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培育了大量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推向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大量个体民营企业以及通过开放引入的外资企业。这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多元的全面协调的动力机制。

五是积极融入全球化，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发展奇迹，十分得益于中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到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已有22个大类、167个种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93.3%和96.1%。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加速了自身的市场化进程，培育自身的全面发展动力，同时顺应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共赢趋势，为世界制造业发展和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是重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互动，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过程。工业为城市化提供了经济基础，而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了优质要素和广阔的需求市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符合上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演进规律，长期以来中国成功地推进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但总体上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对工业化进程牵引需求作用明显。

上述六个方面产业发展的中国智慧，构成了产业发展中国方案重要内容。这

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可以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中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借鉴中国产业发展经验和智慧时，同样也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创造性发展。不仅如此，对于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智慧也还需要在未来中国产业从做大到做强的发展过程中，继承、发扬、创新和完善。

科技引领：超越传统后发优势

李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40年来，中国科技由弱到强，不断超越，极大地支撑和引领了中国经济持续平稳高速发展。中国科技发展一直努力探索解放和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最优道路，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建设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最初的恢复科技体系和科技水平，到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再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与管理，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直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充分体现了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实现了科技工作不断创新升级、科技引领经济实现后发赶超的伟大历程。

中国科技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国家重大科技部署，科技发展40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1978—1985年科技恢复与重建；二是1985—1995年科技体制改革与适应；三是1995—2006年科技发展与赶超；四是2006—2012年科技支撑发展与自主创新；五是2012年至今科技创新国家战略与科技引领。

科技体改解放生产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自此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院所进行管理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进入实施科研机构转制和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阶段。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革开放40年来，持续性系统性的科技体制改革和战略规划，极大地解放了科技生产力，持续提升了国家创新能力。

科技跨越引领经济发展。在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推动下，中国经济40年来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科技投入规模已居世界前列，知识产出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科研人员规模位居世界首位。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新格局，构建重大创新策源地，打造科技创新“国之重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为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强力技术支撑。在高速铁路、智能终端等领域，中国崛起一批具有全球影响的创新型科技企业。中国高技术产业从1980年代起步，此后经过三十多年“准备成长期”“全面成长期”的跨越式发展，如今迈入了快速发展新的黄金时代，中国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大国。中高技术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制造业水平，成就了文明今世的中国制造。

科技创新彰显中国智慧。中国科技创新经过40年的不断摸索和拼搏，迈向了科技大国的第一方阵。中国科技不断超越，得益于持续不断的制定和调整国家科技战略规划，充分发挥前瞻性引导性作用；正确把握科技体制改革方向，发挥将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制度优势；始终坚持服务国家发展全局，面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将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有机结合，快速缩短与世界科技前沿的差距；重视科技人才和科技创新环境，充分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这是举国体制的集中体现，中国智慧的充分彰显。

中国的生态智慧

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狭义地讲，生态文明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而广义地说，生态文明则是一种发展的状态或阶段，标志或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或是相对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一个新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社会文明形态。

从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和谐共生，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也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演进阶段。1978年的改革，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开放前战天斗地引发的生态失衡中恢复生态平衡的过程；开放引进的环保理念和治理改革催生的乡镇企业污染，成为1990年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2001年中国加入WTO，重化工阶段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使得污染控制、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进入全球视野，整体恶化态势凸显；201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生态文明超越手段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美丽中国”写入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绘制了绿色未来的宏伟蓝图。绿色发展理念下所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不仅使中国更加美丽，也在示范和引领全球的可持续转型，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发达国家的“绿色”理念，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要求发展中国家停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罗马俱乐部的“零增长”以保护全球环境；按照发展中国家污染治理成本低的效率原则，以邻为壑，将有毒有害的各种固体废弃物倾销到发展中国家以维护自身的绿色；掌控核心技术牟取暴利，转移生产设施，将污染排放生态灾难转移到作为“污染港湾”的发展中国家。以牺牲他人之绿色来实现自我绿色，显然有违绿色发展理念，不可持续。

中国奉行绿色发展的理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具体表现在：一是贡献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通过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理念的改造和提升，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2015年联合国峰会上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人与自然和谐”数次在文本中出现；人本、环境、繁荣、和谐和共赢的愿景，内涵体现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二是行动引领。中国的绿色发展不是喊口号，不是豁免自己而强求他人，而是踏石有印、抓铁留痕、撸起袖子实打实地干。2009年哥本哈根提出的2020年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巴黎协定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绩效优于预期。中国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比联合国明确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前10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零碳电力，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太阳能热水市场规模雄冠全球；中国的造林面积、森林蓄积量新增碳汇，也领先于世界。三是合作共赢。不论是国际治理，还是绿色投资，秉持开放和谐包容理念，力推全球绿色转型发展。

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不寻求世界霸权，不追求唯我利益。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致力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创造全球绿色发展的新格局。

人力资源：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高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充裕的人力资源供给，为中国经济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保持了较高水平，人口抚养比较低。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因而高比例生产性人口使得经济增长在正常的增长幅度之上再提高一个部分，这个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就是人口红利。研究显示，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1/4左右。

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不会自动成为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只是经济增长的潜在机遇，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能否得以实现，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市场自由度、人力资本状况等条件匹配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政策不断改革，大量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村配置到生产率高的城市，大大提升了整体经济的效率。中国不断强化对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益的保障，基本形成了消除农民工就业歧视和促进机会平等的法律框架。教育和职业培训得到大发展，中国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提高。这些都有效地保障了中国人口红利的实现。

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逐渐递减、人口抚养比开始增加，人口红利逐渐减弱。预测表明，中国总人口还将保持七、八年左右的增长，到2020年约为14.12亿，并将在2026年左右达到高峰，峰值约为14.22亿；此后一路下滑，到2037年下降至14亿以下，到2050年约为13.13亿。在这种情况下，以往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增长、资本形成和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都逐渐趋于减弱。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用劳动力的质量替代劳动力的数量。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人才，积累和释放人才红利，由此带来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类比人口红利，人才红利是指受过较好教育或培训的劳动者即人才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的额外推动力。人才红利是大量有所专长、综合素质较高的知识型、技能型劳动者，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劳动者为经济所带来的收益。2010年中国首次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结果显示，中国人才资源总量达到1.2亿人，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反映出人才红利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积累和释放人才红利，中国必须全面提高人力资本，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自主创业，充分开发利用老年人才资源。

包容性发展的中国社会保障

王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日益扩大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保障，提升了发展的公平性、普惠性。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符合国际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

第一，坚持社会保障“保基本”的定位，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建设相互协调。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在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增速很高、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迅速变革中进行改革和建设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只有经济快速增长才能快速摆脱贫困。社会保障建设早期定位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企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由于担心过快的社会保障支出造成巨大负担、拖累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确立了“保基本”的社保发展思路，力图实现两个进程的相互协调。

第二，坚持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渐进式改革逐步完成社会保障制度的转轨与转型。社会保障的发展是从改革传统的单位就业保障制度开始的，改革进程持续不断。主要完成了从单位管理走向社会化管理、从多部门分散管理走向相对集中管理、从地区城乡分割逐步走向统筹协调发展三大任务，实现了社会保障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

第三，坚持政府主导和共建共享原则，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和社会力量作用。政府主导是现代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这是其公平性和普惠制的基本保证。但是，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而不动员社会力量甚至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不仅会导致财政负担日益沉重而且会带来体制的僵化。社会保险制度尽力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服务等领域也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

与，努力建设多支柱、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四，坚持生存型保障与发展型保障相结合，开展扶贫攻坚和积极就业政策。中国一直实施积极的反贫困道路，包括长期以来的扶贫攻坚、精准脱贫政策，目的是通过政府引导、社会扶持，让贫困人口提高发展能力，靠自己的双手和辛勤劳动摆脱贫困。在发展基础性保障的同时，中国还越来越重视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发展性保障，促进劳动者素质技能与人力资本的提升，进而提升劳动者的发展能力与竞争力。

第五，不断扩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保障能力，建立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保障“扩面”与“提质”两个过程相得益彰，使改革转制过程与更多人民群众分享改革红利过程有机结合，使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激励约束、社会公众参与有效配合，使旧制度转型与新制度建设同步推进，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为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

4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的快速发展，与充分学习、借鉴国际经验是分不开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简单照搬社会保障的国外经验，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引领下，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担当、不断探索的结果。新时代对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提出的要求更高，更需要未来继续深化改革。

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

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分配的指导思想以及政策演变具有曲折中前进、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在努力做大蛋糕之时，始终将分好蛋糕视为己任，从而具有某种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特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理论发展，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的变动分为四个阶段。

1977—1987年是收入差异化战略实施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首先确立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开启了收入分配差异化阶段。这一方面激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及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该阶段主要理论创造包括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1986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1987年十三大报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收入分配差异化一方面激励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及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一阶段，城乡差距曾达到最低点，同时农村贫困发生率有了大幅度的降低。尽管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该阶段的收入增长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1988—2001年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结合的阶段。该阶段最重要的理论突破在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提出，并逐渐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原则。

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和“先富论”以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结合，一方面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差距的全方位扩大。但由于兜底性思维的存在，政府主导的扶贫开发战略实施，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

2002—2011年为增长与公平并重阶段。在这一时期，收入分配指导思想从注重效率转向增长和公平并重。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重新确立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指导原则，改变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方针。在宏观分配方面提出“两同步”原则。努力通过“提低、扩中、调高”来调节收入差距。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一系列侧重民生的政策调整，终于使得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在2009年后逐渐降低，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2012年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与共享发展的阶段。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习近平同志将共享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并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精准扶贫战略和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的举动，都是对公平与效率平衡关系的进一步推进。

综观40年中国收入分配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的演变，我们会发现在不同时期，因主要任务的不同，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上会有所侧重。中央决策者在尽力保障经济增长之余，能够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从打破公平与效率的低水平均衡开始，逐步发展到公平与效率在较高水平的再平衡。

从中国故事、中国智慧到中国经济学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第一，蔡昉院长的《中国智慧》一书选题非常好，把握住了当前社会上最为重要最受关注的问题。社会各界现在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不同部门有不同的切入点。比如高校里最近讨论最多的就是通过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提炼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前些天我有一个发言“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期盼和焦虑”，谈到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局，那就是当我们对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典型事实和规律还没把握清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上升到了范式革命，上升到宏大理论叙事框架的革命上了，这种做法可能有点本末倒置了。我们会发现高校群体里面出现了理论上的急躁症，实践还没完全展开，理论就总结出来了，而过早的理论定型很可能反而使我们的实践和创新束手束脚。理论过度先行，不能真正洞悉世情国情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反而成为我们民族崛起的绊脚石。我之所以说这个题目选得好，就因为本书是在中国方案、中国典型事实、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做法和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基础上来把握中国智慧，而不是从条条框框那种高大上的角度来把握的。讲好中国故事，不是简单把我们教条性、说教性的东西进行宣传，关键还在于我们对实践的把握、对经验的把握、对规律的把握。在这些把握的基础上，我们用不同的方法、理论来提出假设、进行验证，挑战传统的理论，总结出新的规律，提出新的理论范畴、理论概念、理论体系，最后才会上升到新的范式。《中国智慧》一书在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时，从12个方面来进行把握，提炼出这里面的一些经验、规律，特别是可总结、可借鉴的经验，这种把握是非常好的，也是我们现在最为需要的。

第二，写作团队特别强，很多都是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我认真读了好几个篇章，比如序论中不仅仅有经验的总结，更有理论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我们下一步如何构建总书记提到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领域里面来提炼出相应的理论体系，非常重要。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可能应该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认识放到更长的时段、更宽阔的视野中进行把握。我们会发现，如果把改革开放阶段中的一些年份剔除，繁荣景象也就30多年。中国智慧在这40年里面所体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智慧、中国文明生生不息的一些根源在于她的融合性。我们这40年里面，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形

成的大融合在实践和理论的结晶上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第三，在国际层面，任何一次后发国家的赶超，都会形成一种经验模式，都会形成一种理论学派。比如法国路易十四的赶超，有科尔贝尔；德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赶超，有历史学派；日本在整个1970年代的赶超，有产业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的赶超有没有这个呢？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其他几个国家的赶超，很重要的一点是都突破了低水平陷阱。而更重要的突破是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我们的赶超还在进行时。因此，我们在思考这轮赶超的过程中，很多总结还没展现出全貌，有些总结可能还要留有余地，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如果我们过度理论化、范式化、模式化，认为它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可能对于突破下一步的一些陷阱、一些困局反而是一种障碍，而不是我们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激发我们进步的动力。■